心理科学进展 2018, Vol. 26, No. 2, 283–293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18.00283

儿童的社会权力认知及其与社会行为的关系*

程南华 [1,2] 李占星 [1,2,3] 朱莉琪 [1]

([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3]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心理学研究所，西安 710049)

摘 要 有关成人社会权力认知的研究已有大量的成果及理论，但儿童的社会权力认知近期才受到关注。社会权力认知是儿童社会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权力经常体现在社会支配及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从很早开始，儿童就能基于不同的线索来判断社会权力，儿童基于这些线索的认知发展有进化上的适应意义。儿童对社会权力获得方式的认知会随年龄增长而发生变化，年幼儿童更认可基于支配的社会权力获得方式，而年长儿童更认可基于声望的社会权力获得方式。儿童的社会权力认知会影响选择性信任、资源分配及亲社会行为。未来研究需要考虑影响儿童社会权力认知发展的内部机制以及儿童社会权力对社会行为影响的过程机制，并考虑文化因素和早期互动经验对儿童社会权力认知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 权力线索；权力获得方式；资源分配；选择性信任；亲社会行为

分类号 B844

1 前言

社会权力(social power)一直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关注的热门议题。Russell (1938)认为“社会科学中的基本概念是权力，就好像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是能量一样”，因此社会权力存在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长期以来，社会权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人群体，而对儿童社会权力认知的关注较少。社会权力的差异不仅存在于成人的社会关系中，也存在于儿童的社会关系中，比如同伴、亲子之间，也存在着支配和被支配、权威与服从的社会权力分布。从进化的角度看，儿童对社会权力的认知具有进化的基础，准确判断社会权力有利于个体的适应。由于资源短缺，社会团体中竞争时刻存在，个体假如能够准确判断社会权力的相对高低，则会避免不必要的能量消耗与伤害(Hawley, 2016)。同时，学步儿以及学前儿童会更加喜欢那些拥有资源的个体，即使资源是通过强压的、攻击性的行为获得的(Hawley, 2002)；他们也更喜欢与高社会权力者结成联盟，模仿他们、学习他们(Pettit, Bakshi, Dodge, & Coie, 1990; Roseth, Pellegrini, Bohn, van Ryzin, & Vance, 2007)。因此，作为一种增加生存适应性的自利策略，早期儿童会更多地对高社会权力者表现出积极的偏好，从而获得与权力有关的社会优势。

社会关系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社会权力又是社会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正确地识别社会权力关系，进而指导社会行为，这是个体最基本的能力，也是增强社会适应的基本途径(Hawley, 2016)。另外，随着近年来朴素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发展心理学研究者认为，朴素社会学(naive socialology)理论可以为儿童社会认知发展提供理论基础(Hirschfeld, 2007; Rhodes, 2012, 2013)。比如，幼儿对于人类种族间差异的推断就伴随着对社会类别的朴素理论的理解(Hirschfeld, 1995)。儿童的社会权力认知是社会认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感兴趣于儿童早期对社会关系的朴素认识，并对社会权力影响儿童社会行为的过程加以探索。本文首先介绍社会权力的概念，进而综述儿童社会权力认知的发展过程及社会权力对儿童社

收稿日期：2017-05-17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4ZDB161)和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KSZD-EW-L04)以及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国民重要心理特征调查》(2009FY110100)资助。
通信作者：朱莉琪, E-mail: zhulq@psych.ac.cn

会行为的影响，最后展望儿童社会权力的未来研究方向。

2 社会权力的概念

社会权力的研究由来已久，不同研究者对社会权力的界定不同。社会学研究中，Russell (1938)认为权力就是个体意图作用的产物；Weber 认为权力是社会关系中的高权力者在受到阻止时仍能继续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可能性大小；而 Dahl 进一步明确了社会权力使得社会关系中的高权力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低权力者做他不想做的事情(引自 Fiske & Berdahl, 2007)。这些概念反映社会权力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同时产生于社会互动的过程。社会心理学研究中，Keltner, Gruenfeld 和 Anderson (2003)将社会权力定义为个体通过提供或者收回资源，实施惩罚改变他人状态的相对能力，是对有价值资源的不对称控制。Fiske 和 Berdahl (2007)界定社会权力为对有价值结果的不对称控制，这里的结果不仅是资源或者是惩罚(包括了生理上的，如健康、安全等)，还有经济上和社会上的结果(如社会归属感、共享知识、自我提升及社会信任等)。总体而言，社会权力可以概括为在社会关系中，高权力者对有价值资源的控制，这个资源既包括物质资源(如食物、金钱、经济能力等)，也包括社会资源(如知识、友谊、决策机会等)。

成人社会权力的研究大多依照上述定义采用“社会权力”术语进行表述，但是儿童社会权力的研究还使用了一些其他表述的术语，这些术语的操作定义与“社会权力”的定义大体相同，主要包括社会支配和社会地位的部分研究。这主要是因为“社会权力”“社会支配”和“社会地位”三个概念在儿童群体中的表现没有太大差异，都是儿童对资源的不对称控制，以至于研究者在这些概念之间会交换使用。社会支配(social dominance)的概念最初来自于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是指动物群体中个体通过强迫和镇压的方式获得资源。后来这个概念延展到对儿童社会权力形成的研究中，指代高支配性的个体或团体战胜低支配性的个体或团体，并对他们产生影响(Hawley, 1999; Pun, Birch, & Baron, 2017)。社会支配常被作为权力的一种获得方式和拥有权力之后的表现(Keltner et al., 2003)。比如, Hawley, Johnson, Mize 和 McNamara (2007)在探究 3~5 岁幼儿的权力和地位对外表吸引力的影响的研究中，将社会支配性作为儿童权力的一种形式，并认为这是儿童获得资源最主要的方式。另外，社会地位也经常与社会权力的概念在儿童研究中交换使用。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较高代表个体在社会群体中获得他人尊重，具有较高声望。在儿童研究中，通常通过同伴提名的方式进行测量(Cillessen & Rose, 2005)。有研究者认为, 8 岁以前的幼儿获得社会地位的方式是通过对玩具、游戏场地等资源的争夺，最后获得资源的个体社会地位较高(Kalish, 2005; Guinote, Cotzia, Sandhu, & Siwa, 2015)。

本文中的社会权力概念在操作上定义为个体或团体对资源的非对称的控制力(例如 Kalish, 2005; Hawley et al., 2007; Guinote et al., 2015; Guinote, 2017)。所以，符合该操作定义的社会支配及社会地位的儿童研究也可纳入到本综述的范围之中，但在表述上我们依然采用原有文献的表达。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在综述社会权力研究时采用了一些表述为社会地位或社会支配的文献，但这是由于这些相关文献中概念所采用的操作定义与社会权力的概念类似。在以后的幼儿社会权力研究中，我们认为对这三种概念之间的辨析及正确使用仍是非常重要的。

3 儿童社会权力认知的发展

当前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考察儿童对社会权力认知的发展：首先，不同年龄的儿童如何基于一些线索觉察社会权力的高低；其次，儿童理解社会权力的获得方式是否存在年龄上的差异。以下从这两个方面探讨儿童社会权力认知的发展。

3.1 儿童对社会权力线索的认知发展

社会权力可以通过一些线索来加以识别。现有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儿童早期经历的社会情境暴露以及社会互动不多，但是他们也会通过一些线索判断社会权力的大小。

3.1.1 权力认知的物理线索

研究表明, 1 岁前的婴儿能够通过一些外在的物理线索来判断社会权力的大小，这些物理线索包括个体的物理尺寸大小(physical size)、所在团队的成员数量多少等。通过考察婴儿在不同情境下对物体的注视时间，研究者可以推断婴儿的认知偏好。研究者给婴儿呈现两个物理尺寸不同的动画形象争夺同一资源的场景。结果表明，10 个

月和 13 个月的婴儿在观看物理尺寸更小的动画形象获得资源时比在观看更大的动画形象获得资源时的注视时间更长，而更小的 8 至 9 个月的婴儿对两种情境下的注视时间没有差异。这说明 10 个月以上的婴儿会通过个体的物理大小预期社会支配力的大小(Thomsen, Frankenhuis, Ingold-Smith, & Carey, 2011)。另一项研究发现，当观看一个所在团队成员数量较多的动画形象和一个所在团队成员数量较少的动画形象争夺资源时, 6~9 个月的婴儿看到后者获得资源时注视时间更长，表明 6~9 个月婴儿会预期来自于团队人数更多的个体社会支配力大更大，因而对超出预期的小团队成员获得资源时注视时间更长(Pun, Birch, & Baron, 2016)。以上研究表明，即使是 6 个月的婴儿也能够根据一些外在的线索判断个体社会权力高低，虽然没有更小年龄婴儿的研究证据支持，但是目前的研究结果足以表明一种可能性：婴儿已经表现出对促进社会团体适应性的社会权力的敏感性，儿童对社会权力的认知可能具有进化上的先天性。

以上研究表明婴儿 6 个月便能够表征个体社会权力关系，并且对来自不同成员数团队的个体社会权力表征要早于对个体物理大小的社会权力表征。目前对婴儿的研究大多通过观察他们对不同情境的注视时间判断他们的社会权力认知，未来可以通过更加精确的技术手段(眼动跟踪技术)得出婴幼儿判断社会权力线索的权重，比如婴幼儿对不同面孔特征个体感知到的权力差异具体来自于哪些面孔特征。

3.1.2 权力认知的表情和姿势线索

一些表情和姿势线索对于我们识别社会权力的大小具有重要作用。当一个低眉顺眼的人面对一个趾高气昂的人时，我们通常认为后者的社会权力比前者更大。一个双手叉腰的人在面对一个向其弯腰的人时，我们认为前者比后者的社会权力更大。近期的研究表明，幼儿也能基于表情和姿势线索判断社会权力。比如，Keating 和 Bai (1986)的研究表明，4 岁幼儿经常评价眉毛较低，没有微笑的成人相比眉毛较高面带微笑的成人具有更高的社会权力。另一项研究表明, 5 岁和 6 岁的幼儿仅仅通过非言语信息就能够判定两个成人中哪个成人的社会权力更大。这些非言语信息包括开放的姿势、仰头、眼神直视对方、眉毛低下、声音低沉等等，并且在动态的录像中呈现和在静态的照片中呈现效果相近。但是 3~4 岁幼儿需要言语线索辅助(比如高权力者需要告诉低权力者如何做)才能正确判断两个成人的社会权力高低(Brey & Shutts, 2015)。所以，儿童在 5 岁左右便可以仅仅依靠诸如表情和姿势线索等非言语线索判断个体社会权力高低。

3.1.3 权力认知的社会类别线索

一些社会类别线索，也能暗示社会权力方面的信息。比如，由于男性经常占据社会中较高的职位，我们通常认为男性的社会权力比女性更大；此外，幼儿由于经常受到父母的管制，所以直觉上认为儿童比成人的社会权力更低。除了个体外在表现的表情和姿势等个体特征线索，儿童也经常采用社会类别线索思考他人并判断社会关系，比如性别、年龄等。社会类别本身带有很多的信息，将个体进行分类，儿童能够更加有效地进行信息加工，节约信息加工成本(Shutts, Pemberton, & Spelke, 2013)。虽然有研究表明 3 岁幼儿会表现出对于自身性别的偏好，但是无论男生或者女生都判断男生的社会权力要大于女生(Gülgöz, 2015),这说明 3 岁幼儿能够抑制自己的喜爱偏好，判断男生社会权力大于女生。3 岁的儿童同时也能够通过年龄判断社会权力大小，他们判断高年龄组个体社会权力高于低年龄组个体(Charafeddine et al., 2015; Gülgöz, 2015)。

虽然目前没有研究专门探究儿童对不同年龄和性别群体社会权力判断的认知机制，但是我们从资源获得的角度推测, 3 岁幼儿可能认识到男生或者年龄更大的个体身体大小及力量均更大，所以推理他们具有更大的可能获得资源。而 3 岁幼儿、甚至更小的 1 岁婴儿就能判断获得资源的个体社会权力更大(Mascaro & Csibra, 2012; Gülgöz & Gelman, 2017)，所以他们判断男生以及年龄较大个体相比女生以及年龄较小个体社会权力更高。

3.1.4 权力认知的社会互动线索

现实生活中我们判断社会权力的大小更多依赖于一些社会互动线索。目前的研究表明，幼儿社会权力认知依赖的社会互动线索包括资源获得、目标达成、下达命令、制定规则，以及模仿等。Gülgöz 和 Gelman (2017)将权力有关的社会互动线索分为五类：资源获得、目标达成、下达命令、允许/禁止他人行为、制定规则。在资源获得线索中，两个孩子都想玩同样的玩具，最终一个

孩子玩了玩具，另一个孩子在旁边看着，以此暗示最终占有资源的孩子社会权力更高；在目标达成线索中，两个孩子的目标产生冲突，最终达成自己目标的孩子社会权力更高；在下达命令线索中，一个孩子告诉另一个孩子应该做什么，表明下达命令的孩子社会权力更高；在允许/禁止线索中，一个孩子能够允许或者禁止另一个孩子做他想做的事情预示着这个孩子社会权力更高；在制定规则线索中，一个孩子在团队中制定规则，要求其他的孩子按照自己设定的规则行事表明他的社会权力更高。Gülgöz 和 Gelman (2017)的结果表明，对于这 5 个方面的线索，儿童从 3 岁只能识别资源获得与目标达成及允许/禁止他人行为的社会权力线索，到后来 5~6 岁理解社会权力的设定规则线索，再到 7 岁达到成人水平，能够判断下达命令的个体社会权力更大。因此根据研究的结果我们可以推断儿童对获取自我利益有关(如资源获得、目标达成)的社会权力认知要早于需要考虑他人利益的社会权力认知(如设定规则、下达命令)。

模仿也是一种暗示社会权力大小的互动线索。研究者发现，给儿童呈现一段视频，视频中有两个成人，一个成人模仿另一个成人的坐姿、选择围巾的颜色、对一个物体做的动作等一系列行为，然后让儿童判断这两个成人中谁的社会权力更大，5 岁幼儿判断被他人模仿的个体比模仿他人的个体社会权力更大，而 4 岁幼儿则不能基于模仿关系判断社会权力(Over & Carpenter, 2015)。4 岁和 5 岁幼儿基于模仿互动判断社会权力关系的差异可能是因为 5 岁幼儿经历更多的友谊关系和更多的社会权力层级暴露。

对于更小的婴儿而言，他们也能够通过社会互动中的资源获得线索理解社会权力的大小。例如，12~15 个月婴儿可以基于在争夺中获得资源以及在社会互动中占领他人领地判断个体社会支配力更高；并且他们能够表征这种社会支配力为一种关系，而不是一种个体特征，当互动对手改变时，婴儿并非预期高权力者仍为之前情境中的高权力者，而是通过新的社会情境重新进行判断(Mascaro & Csibra, 2012)。还有研究发现 1~3 岁的学步儿能够在早期的互动过程中根据自己与对手的历史输赢情况判断自己与他人的社会支配性关系(Hawley & Little, 1999; Pellegrini et al., 2007)。另外，3 岁幼儿根据社会互动的结果(两次冲突争斗中均胜利、两次冲突斗争最后都玩了自己想玩的玩具、获得更多的资源)就能够推断谁更具有社会支配性(Charafeddine et al., 2015)。

以上社会权力线索的实证研究表明，儿童对于社会权力不同线索的认知发展表现出与人类进化一致的进程(Hawley, 1999)。儿童最开始识别更加有利于个体适应性的早期适应(early adaptation)线索，比如团体人数多少，个体身体大小，资源获得和目标达成等，到后来慢慢识别有利于社会互动的权力线索，需要表征社会道德责任以及个体间共同意图的能力，比如模仿与被模仿关系、下达命令、制定规则等，因此这些社会权力方面的认知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关系进化过程中相对近代的适应机制(relatively recent adaptation; Rakoczy & Schmidt, 2013)。

综上所述，从进化学的角度看，儿童认知社会权力的线索大致从早期适应性线索(团体人数多少、个体身体大小、资源获得和目标达成等)往后来的相对近代适应性线索(表情与姿势线索、模仿与被模仿关系、下达命令、制定规则等)发展。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越来越多地卷入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他们更加需要理解不同场景中的社会权力关系。但是这些研究只是发现了年龄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很好地解释经验在社会权力认知中的具体作用机制，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究儿童社会权力认知年龄差异背后的经验影响机制。

3.2 不同年龄儿童对社会权力获得方式的认知差异

社会权力可以通过支配他人的方式获得，也可通过赢取声望的方式获得(Cheng, Tracy, Foulsham, Kingstone, & Henrich, 2013)。基于支配力(dominance-based)的策略是指个体通过强制力、强压以及暴力等反社会方式获得权力；而基于声望(prestige-based)的策略则是个体通过自己的能力和技能获得他人的尊重，钦佩和赞赏等亲社会方式获得权力。儿童能否区分这两种不同的获得方式？Gülgöz 和 Gelman (2017) 将社会权力效价分为恶意的和善意的社会权力表现，恶意的两种社会权力表现是个体通过强权的方式获得权力，得到资源，达成目的，而善意的社会权力表现则是个体获得资源获得达成目的的过程包括了他人的主动谦让以及主动达成公平。结果发现，3~9 岁儿童对

于恶意的社会权力认知判断优于善意的社会权力判断，暗示较小年龄儿童理解恶意的社会权力获得方式好于理解善意的社会权力获得方式。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儿童对于这两种社会权力获得方式的认知会表现出差异，表现为最初认可基于支配性的权力获得到后来越来越偏好于认可基于声望的权力获得。研究发现，学步儿和学前儿童的社会权力绝大部分是争夺资源中获得，包括对物品所有权的争执、对游戏领地的占领等强制行为(Strayer & Strayer,1978)。虽然这些行为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强压和攻击行为，但是这个年龄段的儿童认可这样的社会权力的获得方式，会对通过强制方式获得社会权力的个体更多的社会关注，表现出喜欢与联盟偏好，并且分给他们更多的资源(Hawley, 2002; Roseth et al., 2007; Grueneisen & Tomasello, 2017)。到儿童 5 岁左右，他们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关系，表现出对他人更多的关注、让步、分享和帮助行为，以此增加他们在团体中的支配力(Hawley & Little, 1999)。这个时期是儿童价值观以及抽象表征能力开始形成的阶段，他们对通过强压方式获得社会权力的个体的态度会越来越消极。等到 8 岁，儿童对这两种社会权力获得方式的认知就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儿童在实际社会关系中，将这两种获得权力的策略区分开来：一些儿童通过纯粹的强压行为来获得权力，会变成不受欢迎的欺凌者；而另一些儿童则会通过受大家喜爱的亲社会方式获得社会权力(Hawley & Little, 1999; Hawley, 2002)。8 岁儿童已经不认为通过强压的方式是一种积极的方式。因此，那些通过支配性策略以及攻击性行为获得社会权力的个体会逐渐受到同伴的排斥。有研究表明，虽然小学一年级的男孩偏爱具有支配性的同伴，即使他们表现出很多的攻击行为，但是到了三年级，他们和成人一样不喜欢基于支配力策略的同伴(Dodge, Coie, Pettit, & Price, 1990; Pettit et al., 1990)。同时，这个年龄阶段的儿童更加认可基于声望策略的高社会权力者，研究也表明，这个年龄阶段的儿童会对受支配者(社会权力较低的个体)比支配者(社会权力较高个体)分配更多的资源(Charafeddine et al., 2016)。他们也认为基于声望策略的获得权力个体可以为集体带来利益。因此对于能够提升集体利益的高社会权力者，儿童会分给他们更多的资源 (Kogan et al., 2011)。

综上，通过支配策略(强压以及攻击性的反社会行为)获得社会权力可能只是年幼儿童普遍接受的规则。但是这种社会规则的有效性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不断降低，而通过声望策略(来自他人的尊重与赞赏)的社会权力在较大年龄的儿童中得到更多的认可。

4　社会权力对儿童社会行为的影响

之前综述表明, 3 岁甚至更小的婴幼儿就能基于一些线索判断社会权力关系，那么当他们理解了社会权力之后，能否运用社会权力信息指导自己的社会行为呢？目前研究主要考察了社会权力对儿童以下三个方面社会行为的影响：

4.1　选择性信任

儿童在进行学习或者社会判断的过程中，当面对不同个体给出的陈词时，会有选择性地采纳特定个体的意见，这就是选择性信任(selective trust, Kinzler, Corriveau, & Harris, 2011)。研究表明社会支配性高低作为具体情境下的个体特征属性，会影响儿童选择不同权力个体提出的陈词(Bernard et al., 2016; Castelain, Bernard, van der Henst, & Mercier, 2016)。研究者通过两个实验情境操纵两个人物形象的社会支配力的不同：在身体优势情境下，两个小朋友抢夺同一个玩具，最终得到玩具的小朋友预示着社会权力更高；在决策情境下，两名小朋友争夺放置衣柜位置的决策权，一个小朋友想把衣柜放在黄色的床边，另一个小朋友想把衣柜放在棕色床边，最终拥有决策权的小朋友预示着社会权力更大。随后在陈词选择阶段呈现另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情景(一条丢失的小狗的主人寻找小狗)，上述故事情境中的两个小朋友给出相反的两种答案(丢失的狗去了马路左边或者马路右边)，被试选择他们更加相信哪位小朋友的答案。结果发现，无论社会支配性是因为身体优势获得还是从决策能力体现, 3 岁和 5 岁的幼儿都会更多地采纳高支配个体的陈词(Bernard et al., 2016; Castelain et al., 2016)。关于社会支配性影响儿童的选择性陈词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从社会适应的角度而言，儿童采纳支配者的陈词可能是为了迎合支配者，同意支配者的观点使得支配者更加喜欢自己，因此他们倾向于采纳支配者的陈词。这类似于儿童会采纳大多数人的意见而非少数人的陈词，当大多数人给出的陈词和他们

自己的判断相违背的时候也会听从大多数人的意见(Bernard, Harris, Terrier, & Clément, 2015)，听从大多数人的意见比听从少数人的意见更加有利于社会适应。另一种解释从能力角度阐述，儿童相信社会支配力更大的个体是因为社会支配力更大代表能力更强，比如有研究表明儿童会判断社会支配力更高的个体能力更强(Charafeddine et al., 2015)，因此更加相信支配力高的个体的陈词。

今后的研究需要注意社会权力，能力与选择性信任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儿童首先判断谁的社会权力更大，然后是谁的能力更大，再给出他们对选择性信任的预测。另一种情况是，儿童根据描述的场景直接判断谁的能力更强，谁的社会权力更大，然后再同时根据权力与能力高低的结果进行选择信任的对象。因此在研究中需要在呈现的引导材料中将能力和权力区分开来。

4.2　资源分配行为

另一种研究者关注较多的社会行为是幼儿的资源分配行为。资源分配任务通常的做法是，给幼儿呈现一些资源，要求其在不同个体之间进行分配，或者是给幼儿一些可供选择的资源分配方案，幼儿作为第一方角色(分配方案与自己的资源获得有关)或者第三方角色(分配方案与自己的资源获得无关)进行资源分配或分配方案的选择。然而幼儿作为第一方角色在社会权力情境中的资源分配研究可能因为操作范式上的困难，很难操纵幼儿自身的高低社会权力，目前并未有研究进行实证考察。虽然在成人研究中，研究者通常采用角色扮演(随机分配被试为经理人或员工，前者为高权力者，后者为低权力者)或者回忆法(给被试呈现权力定义，让被试回忆写出自己对他人拥有权力的具体事件)、语义唤起(利用词干补笔的方法，给高权力者的单词中，与权力有关的单词占大多数，而控制者的单词与权力无关)等方法操纵权力获得(见综述：魏秋江，段锦云，范庭卫, 2012)，但这些方法均不适用于幼儿。但是幼儿即使很小就能理解权力概念，也还不能根据权力概念很好地还原场景，建立心理权力感。因此目前儿童社会权力对资源分配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幼儿作为第三方时的资源分配。

儿童作为第三方角色时，儿童对于不同社会权力大小的个体的资源分配结果有两种可能的假设：匹配假设(Match Hypothesis)和补偿假设(Compensate Hypothesis)。匹配假设是指幼儿在社会权力情境中能够识别社会权力关系，他们为了保持这种社会权力关系，从而匹配社会权力关系和资源分配，也就是分配给权力高的个体更多资源，而分给权力低的个体更少资源。补偿假设则是指儿童识别了社会权力的差异之后，认为这种社会权力的获得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为了补偿这种不公平，他们会给社会权力低的个体分配更多的资源，而给社会权力高的个体分配更少的资源。基于以上的两种假设, Charafeddine 等人(2016)探究了 3~8 岁儿童在社会支配情境下的资源分配行为。研究发现，儿童在社会支配性情境下的资源分配模式出现了年龄上的差异。具体而言, 3 岁和 4 岁幼儿更偏好支配者，分配给他们更多的资源，符合匹配假设; 5 岁幼儿对支配者和受支配者的资源分配没有显著差异; 8 岁儿童则分配给受支配者更多的资源，以平衡社会支配性所带来的不公平感，符合补偿假设。

对于社会权力影响儿童资源分配行为的发展研究，研究者需要同时考虑他们各个心理能力的发展进程，其中有几个重要的社会性特点可能是社会权力认知影响资源分配行为的主要变量，包括儿童的共情能力、公平敏感性、对社会权力获得方式的认知、以及对权威的认知等因素。随年龄增加，儿童会表现出对于受害者(比如社会情境中的受支配者)更多的关心(Eisenberg, Fabes, & Spinrad, 2006; Malti, Gummerum, Keller, & Buchmann, 2009)，同时会对公平与否更加敏感(Fehr, Bernhard, & Rockenbach, 2008; Shaw, Choshen-Hillel, & Caruso, 2016)，以及他们越来越不认可基于支配的社会权力获得方式(见前文“3.2 不同年龄儿童对社会权力获得方式的认知差异”的阐述; Hawley, 1999)，因此年长儿童会分配给低权力者更多的资源。

综上所述，儿童作为第三方角色时表现出从学前期匹配权力关系，分给高权力者更多资源，到小学期为了公平补偿社会权力分配，对较低权力个体分配更多资源的转变。目前的研究只是基于已发现的年龄差异推断儿童基于社会权力关系进行资源分配的机制，但是具体哪些因素影响儿童基于社会权力进行资源分配的过程，还有待进一步的实验证实。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加具体地验证，社会性能力的发展影响儿童基于社会权力进

行资源分配的内在过程。另外，目前的研究只是针对儿童作为第三方角色时，在高低不同的权力个体之间分配资源的情景。当儿童自我利益卷入时，他们会如何分配资源还不得而知。未来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儿童自我利益卷入时，社会权力对资源分配的影响。首先，从权力的来源出发，探索幼儿群体中高低社会权力的操纵范式。Toffler (1990)认为，在支撑权力的支柱—暴力、财富和知识—当中，知识可以产生更高质量的权力，因为它不仅可用于惩罚、奖赏、劝说，甚至可用于转化集体生产力，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通过知识能力的反馈，研究者可以操纵幼儿的权力感。其次，在研究中需要注意其他影响因素的混淆，比如幼儿公平敏感性、权力角色带来的责任感等。以资源获得的方式操纵社会权力，可能引入高权力儿童因为公平感补偿低权力儿童的混淆因素。比如，高权力幼儿分配更多资源可能不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感，而是公平敏感性的发展让他们觉得，之前是自己获得资源，这次需要通过轮流的方式调整资源分配(Grueneisen & Tomasello, 2017)。当分配不同权力角色给儿童时，研究者还需要考虑这样可能引入儿童责任感的混淆因素，比如高权力儿童分配更多资源，可能不是因为角色所赋予的权力，而是角色所赋予的责任导致。

4.3　亲社会行为

亲社会行为是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自发行为(Eisenberg et al., 2006)。从进化的角度看，个体通过亲社会行为进行社会性投资，从而获得声望与尊重，更有利于生物适应。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研究表明低社会地位的个体会增加社会性投资从而增大生物适应性(Sapolsky, 2005)。儿童的研究也表明，4~5 岁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受社会地位的影响。研究者给两名儿童呈现有吸引力和无吸引力的玩具各一个，让儿童通过争夺有吸引力玩具的支配权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然后给每位幼儿 5 个贴画作为奖励，并询问幼儿是否捐赠贴画给另一位在医院的小朋友。研究结果表明，相比获得有吸引力玩具的“高社会地位”的儿童，得到无吸引力玩具的“低社会地位”儿童捐赠更多的贴画，并且这种亲社会行为与道德推理以及抑制控制能力无关(Guinote et al., 2015)。从进化的角度看，低社会地位可能是一种生存劣势，这种劣势需要个体通过亲社会行为增加他们的声望，获得更高的社会权力、社会支持以及与高权力者联盟的可能性，从而减少自己的生存压力。

虽然相比高社会地位个体，低社会地位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但是当个体自己面对高地位或低地位者时，他们的亲社会行为是否会发生变化？研究者采用公平分配的范式研究他们对不同地位个体的亲社会倾向，根据儿童选择公平方案(1, 1：表示自己得 1 个，对方也得 1 个)的动机设置三种资源选择情境，亲社会情境(1, 1 和 1, 0 两种方案，选择公平方案暗示儿童更加亲社会)、妒忌情境(1, 1 和 1, 2 两种方案，选择公平分配表明儿童不允许对方比自己得到的更多)和分享游戏(1, 1 和 2, 0, 选择公平分配暗示儿童损失自己的利益与对方进行分享)。研究发现，6~11 岁儿童在亲社会情境中，不管对方的社会地位高低，更多地选择亲社会的分配(1, 1)；在妒忌情境中，儿童倾向于让高地位的对方(校长和老师)得到更多(1, 2)；而当需要损失自己的利益时(1, 1 和 2, 0)，儿童却更加愿意与地位较低的接受者(校园看护者)进行分享(1, 1) (Mcguigan, Fisher, & Glasgow, 2016)。

从上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较低社会权力幼儿对陌生人，还是幼儿对较高社会权力的对手，都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因此，低社会权力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可能是重要的生物适应性策略。但是研究也发现当面对不同社会权力高低的对手却需要损失自己利益的时候，儿童却表现出对于低社会权力者更多的亲社会行为。然而，儿童社会权力认知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目前尚且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据，不管是社会权力的认知还是亲社会行为本身都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变化，而单纯某个年龄段的关系并不足以得出完整的结论。目前成人的研究中，大量的证据表明社会地位，社会阶层或者是社会权力降低了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如 Guinote et al., 2015; Piff, Kraus, Côté, Cheng, & Keltner, 2010)，但是儿童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更加确切的证据。幼儿社会权力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可能表现出与成人不一样的模式，同情等其他情绪社会性能力随年龄变化上的发展差异可能调节社会权力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5　小结与展望

人类在婴儿期开始便可以识别不同的社会权

力关系，从最初根据与生物适应有关的物理线索和资源获得线索再到后来发展为注重社会互动的线索，儿童能够越来越适应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另外，他们也对不同的社会权力获得方式表现出随年龄变化的差异，从学前时期认可基于支配性的社会权力获得到学龄期越来越不认可基于支配性的社会权力获得策略。通过对社会权力关系的认知，儿童能够更好地指导他们的社会行为，包括更加相信高权力者的陈词；随年龄增长，对低权力者越来越多的资源分配偏好；社会权力越高表现出更少的亲社会行为。总结之前研究的结果与趋势，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加深入探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考察影响儿童社会权力认知的内在机制。儿童社会权力认知属于朴素社会学的一部分，可能受到其他认知发展的影响，比如儿童的朴素心理学理论(如，心理理论)。理解社会情境下个体的权力关系，需要儿童识别不同个体的愿望与意图以及他们是否达成目标等(Hirschfeld, 2007)，这些可能需要儿童具有心理理论能力与观点采择能力。同时有研究表明执行功能等高级认知能力能够调节个体自动化刻板印象的表达(Payne, 2005)。儿童高级认知能力发展(例如执行功能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对于群体社会权力有关的社会认知。随着高级认知能力的提高，儿童对于群体的社会权力认知会超越之前的群体偏好(比如超越了对自己性别群体的偏好，判断男生的社会权力高于女生, Gülgöz, 2015)。另外，儿童的个体因素也可能会影响其社会权力认知，比如幼儿价值观的差异。有研究表明，低社会权力个体比高社会权力个体表现出更加亲社会的生活目标与价值观(Piff et al., 2010)，学龄儿童价值观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他们对于社会权力获得方式的认知差异。

第二，探究社会权力对儿童社会行为的过程机制。目前针对儿童社会权力与社会行为的研究大多数仅发现不同的社会权力者的社会行为存在差异，但是这个差异的过程与中间机制还不清楚。儿童对不同社会权力个体的资源分配存在年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与一些儿童社会化的因素有关，比如公平敏感性、同情、权力获得策略等。首先，儿童公平敏感性随年龄增加逐渐提高，特别是 8 岁左右的儿童对于有利自己的不公平分配也会拒绝(Blake, McAuliffe, & Warneken, 2014)。而社会权力本身就代表着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儿童可能会更多分配资源给资源获得较少的社会权力较低个体(Li, Spitzer, & Olson, 2014)。另外，同情的发展可能也会导致儿童更多同情社会权力较低个体，从而给他们更多的资源或者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等(如 Hamlin, Wynn, Bloom, & Mahajan, 2011)。再者，学前儿童以及青少年早期儿童获得社会权力的方式既包括基于斗争的支配性策略，也包括基于能力的声望策略(见 Cheng et al., 2013)，之前的研究仅探究了基于支配力策略获得的社会权力，基于声望获得的社会权力对儿童社会行为的影响可能表现出不一样的结果。

第三，注重考察文化因素及儿童早期社会互动环境对儿童社会权力认知发展的影响。从社会文化因素考虑，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公平敏感性可能会影响儿童的社会权力认知。比如，与在传统玛雅文化中成长的 4 岁玛雅儿童相比，在西方文化下成长的美国 4 岁儿童更加注重公平(Morris, 2015)。虽然研究表明相比低权力者的陈词，他们都更加相信高权力者的证言(Bernard et al., 2016; Castelain et al., 2016)，但是研究并没有比较这些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儿童社会权力认知的差异。从社会学习的角度考虑，儿童早期经历的成人价值观传递可能影响他们对于社会权力的认知。例如，对婴儿的研究结果表明婴儿能够理解来自成员数量更大的团队的个体比来自小团队的个体社会权力更大。但是成人的研究却发现，在自我报告的外显测量下，成人会判断更小团队中的个体比更大团队中的个体更可能具有高社会权力和能力，而在内隐测量下表现出与婴儿一致的理解(Cao & Banaji, 2017)。这一结果预示着儿童随着年龄的增加，社会学习的不断深入，他们的权力认知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另外，儿童早期学习社会规则、形成价值观的过程中，从小接触社会权力层级较多的儿童可能更早理解和认知社会权力，比如在成员等级比较森严的家庭中长大的儿童，多兄弟姐妹儿童等。因此可能成人和婴儿社会权力判断之间的差距也来自于社会价值和社会规则的不断强化和学习，从而改变儿童的社会权力感知。

儿童早期的亲子互动经验也可能影响他们对社会权力关系获得策略的认知。有研究表明受虐待儿童比普通儿童在任何年龄段都更可能是恃强

凌弱的欺凌者(Teisl, Rogosch, Oshri, & Cicchetti, 2012)。父母教养实践中体罚可能会增加他们对基于支配力的社会权力获得策略的认可程度，从而导致他们更多地采用这样的方式获得权力。因此，怎样的亲子互动过程更有利于儿童习得符合社会规范的权力获得策略也值得未来的研究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魏秋江，段锦云，范庭卫．(2012)．权力操作范式的分析与比较．*心理科学进展*, *20*(9), 1507–1518.

Bernard, S., Castelain, T., Mercier, H., Kaufmann, L., van der Henst, J., & Clément, F. (2016). The boss is always right: Preschoolers endorse the testimony of a dominant over that of a subordinat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52*, 307–317.

Bernard, S., Harris, P., Terrier, N., & Clément, F. (2015). Children weigh the number of informants and perceptual uncertainty when identifying objec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36*, 70–81.

Blake, P. R., McAuliffe, K., & Warneken, F. (2014). The 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fairness: The knowledge-behavior gap.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8*(11), 559–561.

Brey, E., & Shutts, K. (2015). Children use nonverbal cues to make inferences about social power. *Child Development*, *86*(1), 276–286.

Cao, J., & Banaji, M. R. (2017). Social inferences from group siz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0*, 204–211.

Castelain, T., Bernard, S., van der Henst, J., & Mercier, H. (2016). The influence of power and reason on young Maya children's endorsement of testimony. *Developmental Science*, *19*(6), 957–966.

Charafeddine, R., Mercier, H., Clément, F., Kaufmann, L., Berchtold, A., Reboul, A., & van der Henst, J. B. (2015). How preschoolers use cues of dominance to make sense of their social environment.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Development*, *16*(4), 587–607.

Charafeddine, R., Mercier, H., Clément, F., Kaufmann, L., Reboul, A., & van der Henst, J. B. (2016). Children’s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social dominance situation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2*(11), 1843–1857.

Cheng, J. T., Tracy, J. L., Foulsham, T., Kingstone, A., & Henrich, J. (2013). Two ways to the top: Evidence that dominance and prestige are distinct yet viable avenues to social rank and influ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4*(1), 103–125.

Cillessen, A. H. N., & Rose, A. J. (2005). Understanding popularity in the peer system.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2), 102–105.

Dodge, K. A., Coie, J. D., Pettit, G. S., & Price, J. M. (1990). Peer status and aggression in boys' groups: Developmental and contextual analyses. *Child Development*, *61*(5), 1289–1309.

Eisenberg, N., Fabes, R. A., & Spinrad, T. L. (2006). Prosocial development. In N. Eisenberg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Social, emotion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pp. 646–718). Hoboken, NJ: Wiley.

Fehr, E., Bernhard, H., & Rockenbach, B. (2008). Egalitarianism in young children. *Nature*, *454*(7208), 1079–1083.

Fiske, S. T., & Berdahl, J. L. (2007). Social power. In A. W. Kruglanski & E. T. Higgins (Eds.), *Social psychology: 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 (pp. 678–692).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Grueneisen, S., & Tomasello, M. (2017). Children coordinate in a recurrent social dilemma by taking turns and along dominance asymmetri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3*(2), 265–273.

Guinote, A. (2017). How power affects people: Activating, wanting, and goal seek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8*, 353–381.

Guinote, A., Cotzia, I., Sandhu, S., & Siwa, P. (2015). Social status modulates prosocial behavior and egalitarianism in preschool children and adul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2*(3), 731–736.

Gülgöz, S. (2015). *Developing a concept of social power relationships* (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Gülgöz, S., & Gelman, S. A. (2017). Who's the boss? Concepts of social power across development. *Child Development*, *88*(3), 946–963.

Hamlin, J. K., Wynn, K., Bloom, P., & Mahajan, N. (2011). How infants and toddlers react to antisocial other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8*(50), 19931–19936.

Hawley, P. H. (1999). The ontogenesis of social dominance: A strategy-based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Developmental Review*, *19*(1), 97–132.

Hawley, P. H. (2002). Social dominance and prosocial and coercive strategies of resource control in preschool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6*(2), 167–176.

Hawley, P. H. (2016). Eight myths of child social development: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power, aggression, and social competence. In D. C. Geary & D. B. Berch (Eds.),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on child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pp. 145–166).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Hawley, P. H., Johnson, S. E., Mize, J. A., & McNamara, K.

A. (2007).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in preschoolers: Relationships with power, status, aggression and social skills.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45*(5), 499–521.

Hawley, P. H., & Little, T. D. (1999). On winning some and losing some: A social relations approach to social dominance in toddlers.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45*(2), 185–214.

Hirschfeld, L. A. (1995). Do children have a theory of race? *Cognition, 54*, 209–252.

Hirschfeld, L. A. (2007). Folksociology and the 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culture. *Intellectica, 46-47*, 191–206.

Kalish, C. (2005). Becoming status conscious: Children's appreciation of social reality.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s, 8*(3), 245–263.

Keating, C. F., & Bai, D. L. (1986). Children's attributions of social dominance from facial cues. *Child Development, 57*(5), 1269–1276.

Keltner, D., Gruenfeld, D. H., & Anderson, C. (2003). Power, approach, and inhib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10*(2), 265–284.

Kinzler, K. D., Corriveau, K. H., & Harris, P. L. (2011). Children’s selective trust in native-accented speakers. *Developmental Science, 14*(1), 106–111.

Kogan, A., Saslow, L. R., Impett, E. A., Oveis, C., Keltner, D., & Rodrigues, S. S. (2011). Thin-slicing study of the oxytocin receptor (OXTR) gene and the evaluation and expression of the prosocial disposition. *Proceeding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8*(48), 19189–19192.

Li, V., Spitzer, B., & Olson, K. R. (2014). Preschoolers reduce inequality while favoring individuals with more. *Child Development, 85*(3), 1123–1133.

Malti, T., Gummerum, M., Keller, M., & Buchmann, M. (2009). Children's moral motivation, sympath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Child Development, 80*(2), 442–460.

Mascaro, O., & Csibra, G. (2012). Representation of stable social dominance relations by human infan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9*(18), 6862–6867.

McGuigan, N., Fisher, R., & Glasgow, R. (2016). The influence of receiver status on donor prosociality in 6- to 11-year-old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87*(3), 855–869.

Morris, I. (2015). *Foragers, farmers, and fossil fuels: How human values evolv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ver, H., & Carpenter, M. (2015). Children infer affiliative and status relations from watching others imitate. *Developmental Science, 18*(6), 917–925.

Payne, B. K. (2005). Conceptualizing control in social cognition: How executive functioning modulates the expression of automatic stereotyp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9*(4), 488–503.

Pellegrini, A. D., Roseth, C. J., Mliner, S., Bohn, C. M., van Ryzin, M., Vance, N.,... Tarullo, A. (2007). Social dominance in preschool classroom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sychology, 121*(1), 54–64.

Pettit, G. S., Bakshi, A., Dodge, K. A., & Coie, J. D. (1990).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dominance in young boys' play groups: Developmental differences and behavioral correlat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6*(6), 1017–1025.

Piff, P. K., Kraus, M. W., Côté, S., Cheng, B. H., & Keltner, D. (2010). Having less, giving mor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lass on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9*(5), 771–784.

Pun, A., Birch, S. A. J., & Baron, A. S. (2016). Infants use relative numerical group size to infer social dominan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3*(9), 2376–2381.

Pun, A., Birch, S. A. J., & Baron, A. S. (2017). Foundations of reasoning about social dominance.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11*(3), 155–160.

Rakoczy, H., & Schmidt, M. F. H. (2013). The early ontogeny of social norms.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7*(1), 17–21.

Rhodes, M. (2012). Naïve theories of social groups. *Child Development, 83*(6), 1900–1916.

Rhodes, M. (2013). How two intuitive theories shap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ategorization.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7*(1), 12–16.

Roseth, C. J., Pellegrini, A. D., Bohn, C. M., van Ryzin, M., & Vance, N. (2007). Preschoolers' aggression, affiliation, and social dominance relationships: An observ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45*(5), 479–497.

Russell, B. (1938). *Power: A new social analysis*. New York: Norton.

Sapolsky, R. M. (2005).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hierarchy on primate health. *Science, 308*(5722), 648–652.

Shaw, A., Choshen-Hillel, S., & Caruso, E. M. (2016). The development of inequity aversion: Understanding when (and why) people give others the bigger piece of the pi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10), 1352–1359.

Shutts, K., Pemberton, C. K., & Spelke, E. S. (2013). Children's use of social categories in thinking about people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Cognition & Development, 14*(1), 35–62.

Strayer, J., & Strayer, F. F. (1978). Social aggression and power relations among preschool children. *Aggressive Behavior, 4*, 173–182.

Teisl, M., Rogosch, F. A., Oshri, A., & Cicchetti, D. (2012).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social dominance as a function of age and maltreatment experienc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8(2), 575–588.

Thomsen, L., Frankenhuis, W. E., Ingold-Smith, M., & Carey, S. (2011). Big and mighty: Preverbal infants mentally represent social dominance. *Science, 331*(6016), 477–480.

Toffler, A. (1990). *Powershift: Knowledge, wealth, and violence at the edge of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Bantam Books.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power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behavior

CHENG Nanhua[1,2]; LI Zhanxing[1,2,3]; ZHU Liqi[1]

([1]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Institute of Social Psycholog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While there has been much research concerning how adults understand the social power, recently researcher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interested in how children conceptualize social power. Social power understanding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hildren's social cognition, which can be reflected on the level of social dominance and social status. From early on, children can use different cues to judge social power, and based on these cues their cognition of social power are adaptive in evolutionary fitness. Meanwhile,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power develops across the whole childhood. While younger children are more likely to acknowledge the way to get social power with dominance, older children prefer the way to get social power basing on prestige. Children's cognition of social power can influence their selective trust,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social behavior. Future research should consid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children's social power cognition, and examine the processing mechanis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s social power cognition and their social behavior. Moreover, cultural factor and early social interactive experience should be concerned to contribute to children's cognition of social power.

Key words: social power cues; power attained approach; resource allocation; selective trust; prosocial behavior